

#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下)

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下册/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34-3110-3

I. 中… II. ①许…②邹…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152 号

##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 (下)

许志英 邹恬主编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编: 350003)

开本 850×1168 1/32 22.375 印张 541 千字 4 插页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300

ISBN 7-5334-3110-3/I·184 定价: 4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第四编 延安文学 (1937~1949)         | 1   |
| 第一章 文艺整风                     | 3   |
| 第二章 启蒙与被启蒙                   | 61  |
| 第三章 题材取向 (上)                 | 94  |
| 第四章 题材取向 (下)                 | 144 |
| 第五章 自我忏悔后的文学主题               | 217 |
| 第六章 现代化和民族化                  | 246 |
| 第五编 英雄主义的高扬与人的迷惘 (1949~1966) | 283 |
| 第一章 历史与主体之间                  | 285 |
| 第二章 “人”和“自我”的失落              | 302 |
| 第三章 颂歌与战歌的神喻                 | 332 |
| 第四章 英雄与典型的寻觅                 | 371 |
| 第五章 乡土文学的转型                  | 388 |
| 第六章 “干预生活”的悲哀                | 415 |
| 第七章 逃避现实之路                   | 433 |
| 第八章 “曲笔”的悲剧                  | 450 |
| 第九章 散文的窘态                    | 465 |
| 第十章 政治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             | 485 |
| 第六编 “文革”文学 (1966~1976)       | 515 |
| 第一章 政治灾难与文学灾难                | 517 |
| 第二章 大众文学的极致                  | 540 |

|     |                   |     |
|-----|-------------------|-----|
| 第三章 | 斗争的模式化 .....      | 571 |
| 第四章 | 以太阳为中心的符号系统 ..... | 603 |
| 第五章 | 诗意的疯狂 .....       | 630 |
| 第六章 | 实在与虚妄——人与神 .....  | 661 |
| 第七章 | 文学的新发动 .....      | 682 |

## 第四编

# 延安文学

(1937~1949)



## 第一章 文艺整风

1991年2月7日，一个在延安文艺整风中轰动一时的人物，在被错误处理长达49年后，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他，就是王实味，一个对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记起的名字。公安部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推翻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这一置王实味于死地的不实之辞，同时也恢复了对王实味具有重要意味的“同志”称呼。从此，这个曾抱着圣洁之心献身于革命的忠实信徒，终于洗净了泼在他头上的污秽，一个政治清白的王实味可以盖棺论定了。然而，有关现代作家王实味的话题，似乎并没有结束。王实味，不过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参与者中普通又不普通的一个。我们并不想纠缠于他因两篇针砭现实的杂文继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悲剧事件，而是想通过王实味，通过这个具有嫉恶如仇个性的文人，去透视那段铸造了王实味悲剧事件的历史，以及那段历史里一般知识分子的命运。

1942年初春，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重重封锁着的延安，一场以肃清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为目标的运动，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主持下拉开了序幕。这是一场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整风，文艺界当初并不在毛泽东的考虑范围内。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演说《整顿党的作风》，明确号召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以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了鼓励大家参加整风，在报告最后，毛泽东提出他的希望：“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第二天，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也以首要的位置发表了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进一步阐述毛泽东的观点，并宣称：“共产党人是不害怕自我批评的。我们不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和缺点。相反，自我批评，是我们教育自己、督促自己进步的最有力的武器。对于自己弱点和缺点毫不掩饰，毫不宽容，是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的表现。一切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忠于解放事业的团体和个人，都是应当如此的。”毛泽东和中央整风决策机关显然想通过全体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由来已久的三风不正问题，使全党的思想认识在根本上达到统一，以确保中国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这类党内整风在以后尤其是革命成功后不断重复，不管它们结果如何，其方式几乎如出一辙。但是就40年代初的整风而言，毛泽东的整风愿望和企图都是与历史的要求相合拍的，对具体做法上的指示也显示出足够的诚恳。

正当中央各机关单位普遍传达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以及他在2月8日的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反对党八股》、制订学习计

划、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动员时，热情而又敏感的延安文艺界已躁动不安地闹腾起来了。正值旧历新年，延安军人俱乐部展出了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人的七十多幅讽刺画，这应当算是文艺界投身整风的最初实绩。而围绕着这些讽刺画的讨论，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了讽刺画本身。这些画主要是针对延安新社会中残存的弱点和不足而作的，三位作者坦率直白：“我们已经看到了新社会的美丽和光明，但也看到部分的丑恶和黑暗，这些丑恶和黑暗是从旧的社会中、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新的社会。”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必须是：指出它们，埋葬它们；”对于延安，“我们将以这次的画展来表达我们的热爱。”<sup>①</sup> 尽管有少数作品因内涵的肤浅受到一些批评，但讽刺画作者的创作初衷却得到大多数参观者的理解和认同。有的人认为：“我们生活的宏大河流它本色是光彩动人的，所以我们不但不畏惧反而是需要这指摘的：如同在一个幸福和明朗的城市需要那医生相似。同样是检查社会和帮助新的事物和意识的建立，只是在纸上用不同的手法挑起了这担子，漫画家，也是作为那美好的实际的追求者而工作的。”<sup>②</sup> 另一位赞同者也指出：“在延安的生活中间，不可否认地还残留着某些不健全的、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老是抱着心照不宣，甚至自以为是的态度，那么保险会像太阳里的黑点那样，随着时间逐渐扩大，使阳光减色。”<sup>③</sup> 显然，无论是讽刺画作者，还是讽刺画的评论者，都是站在肯定延安光明面的立场上，抱着希望延安更美好的愿望的。对延安生活和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承认还是回避，是揭露还是掩饰，延安的一

---

① 华君武、张谔、蔡若虹：《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解放日报》1942年2月16日。

② 黄钢：《讽刺画展给了我们些什么》，《解放日报》1942年2月5日。

③ 江丰：《关于“讽刺画展”》，《解放日报》1942年2月15日。

群文艺家们无疑选择了他们应该选择的一面。对延安的热爱、对他们共同献身的革命的忠贞，是他们作出正确选择的根本原因。

早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延安文艺界对延安不完善之处的批评已不少见，仅小说就有《在医院中时》（丁玲）、《厂长追猪去了》（鸿迅）、《间隔》（马加）等，这些作品对延安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工作作风以及其它一些小生产者思想观念引发的弊病进行了严肃的指摘，表现出延安作家面对延安的缺点勇于直言的积极态度。延安三人画展的用意和倾向与上述小说和其他一些针砭时弊的杂文、讽刺诗基本上是一致的，而画家们通过画面展示的内容，对延安一些有心人来说已不陌生。尽管之前的一些小说因对现实的批评曾引起对号入座者的不满，杨家岭方面也曾传来过一些意见，但毕竟没有真正惊动最高决策层。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会之后延安俱乐部的画展吸引了许多延安人的注意，也吸引了一些中央首长的兴趣，毛泽东也曾莅临现场。对华君武的《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毛泽东表示不以为然。在这幅讽刺画中，画家批评了延安一些只知栽树不知养树以至两三年前栽的树非死即枯的不负责现象。毛泽东认为那不能算是延安的植树，只能算作是清凉山一座山头的植树，现在画家“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了全局的东西，个别的東西画成了全体的东西了”。当画家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进行辩解时，毛泽东告诫画家：“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sup>①</sup>如果说漫画作者与漫画评论者（主要是文艺界人士）的分歧，是在肯定讽刺的大前提下，对少数作品讽刺效果深浅程度有不同理解方面，那么画家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却在讽刺的表

---

<sup>①</sup> 参见艾克恩编纂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17页至31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现形式，是否适合于表现人民群众这一正面形象，是否适合于表现延安这个新的社会范围的取舍上。对讽刺漫画的认识，有分歧的各方都超越了这一种艺术形式的单纯理解。有关讽刺画的不同见解，实际上反映了延安文艺界早就出现了一些观点的分歧，如“歌颂”还是“暴露”，“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延安到底需要不需要杂文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讨论者们显然与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对文艺的表态有别。

三人画展对延安现实中不健康、不合理现象的抨击，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整风报告的启发（当然其中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但显而易见，在方法、态度和分寸感等诸多问题上，讽刺画作者参与整风的“热身”活动仍然与整风发动者和主持者的意图和设想不完全一致，虽然其间的距离尚不为人们所觉察到。当新春过后的3月9日《解放日报》又一篇社论《教条与裤子》刊出后，那种距离在人们的意识中更消失得无影无踪。延安的诗人、作家以比画家们更急进的态度投入于这场运动。《解放日报》社论以极富号召力的语言，热切呼吁人们不要停留在呆板的传达讨论上，要鼓起“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切实割掉“三风”不正的“尾巴”。为了免除胆小怯懦者们的后顾之忧，社论再一次强调：“我们自动的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共产党在爱护自己的人们面前严肃的表露自己，是则是，非则非”，那是“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如同盟社和各种汉奸报纸之流，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说是黑，群众就知道是白，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既然当时中央最重要的喉舌《解放日报》的社论以是否暴露自己的阴暗面，作为是否“诚心诚意”反对不正之风的衡量标准，并表现出中央已具备了充分承受“脱裤子”后果的心理准备，所以延安文艺界参与整

风的积极性迅速高涨。当时最有影响的文艺阵地《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也一改“持重”风格，在3月9日之后的二十多天里，连续刊登了一系列弥漫着火药味的稿件。《解放日报》对毛泽东整风号令的配合，在主持这份报纸的博古看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解放日报》始终就把解释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作为报纸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也许3月9日的社论即已注定了博古不久以后必定要作的深刻检讨。这位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最后牺牲于一场意外的空难事故中的优秀革命家，在他主持《解放日报》期间，一直就以勤恳认真、踏实稳重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中央决策层的好感。虽然他那种唯恐“左”倾，只求四平八稳的态度，也曾令一些读者不满，但他的身份和他所做的工作，客观上使他成为报纸的编辑读者与杨家岭中央最高领导之间一条重要的纽带，依据博古个人对毛泽东整风精神的领会，三月份的《解放日报》，尤其是“文艺”副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勇气。

《解放日报》编辑方针的调整，使许多因当时客观形势的限制滞留延安的文人有了一个畅所欲言的机遇。丁玲以她对延安生活较长时间的体验和感悟，写了“安置了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的杂文《“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丁玲不得不多次检讨、多次挨批的精神负担。艾青以他诗人的目光，审视了一般意义上应该存有的作家与作品、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极有针对性地发表了他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意见。革命队伍如何正确对待作家的问題，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延安文人的一个热闹话题。为了延安这件漂亮的衣裳不致肮脏，继丁玲《我们需要杂文》之后，罗烽又写了一篇倡导杂文的杂文《还是杂文时代》，情怀激荡地以示响应。对延安工作中见到的官僚主义作风，雷加在他的小说《躺在睡椅里的人》中进行了尖锐的嘲讽，那个整日躺在椅子上考虑开这个会那个会惟独没有切实行动的医院领

导的形象，给读者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和感触。以坦率著称的萧军在延安始终高举着鲁迅的旗帜，在三月的“文艺”副刊中，他发表了《论终身大事》，从延安妇女问题谈及现代婚姻的意义，真诚地希望延安妇女获得真正的人的地位。在三月份所有稿件中，独领风骚的无过于《野百合花》，它的作者王实味在同时期的刊物《谷雨》上还有另一篇同样引起轰动的杂文《政治家·艺术家》。这两篇文章所论述的问题、所反映的心情与上述稿件并无太大的区别，但它们对延安生活中丑恶、阴暗面的解剖与抨击，其言辞的激烈几乎绝无仅有。当时，不仅仅《解放日报》，其他如延安文协的《谷雨》，青委的墙报《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军直文艺室的《蒺藜》，都以各种文艺样式来揭示延安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表现文艺家们积极参与党的整风、“脱裤子”、“割尾巴”的莫大热情。尽管这些诗、文、画涉及的问题各有侧重，但作者的企图却十分相近。面对着延安仍然残存的旧社会的肮脏与黑暗以及新时代中新滋生的不良倾向，无论是作为革命队伍的普通成员，还是作为正直而有良心的普通知识分子，都无法抑制内心的忧郁、焦虑、愤激，都无法不去揭示进而加以彻底铲除，以使延安社会向着更加光明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二月三人画展作者自白中早已表明的。

然而，延安文艺界的畅所欲言在三月底即宣告进入尾声。整风局势的趋向，对文艺界来说，实在是毫无心理准备的突转。直接触发突变的是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风波。自3月15日创刊后，《矢与的》在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所写的“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的创刊词下，各种杂文、漫画相映成趣。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创刊号上即发两篇大作：《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和包括“辨正邪”、“硬骨头与软骨病”两部分的《零感两则》。他的主要

意见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产生，此外他认为整风“要割大尾巴”，鼓励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精神。对以后几期壁报上王实味的提议和观点，中央研究院同志中有批评也有反批评。3月28日，王实味又写了《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重申他自己做人和做党员的骨头都是硬的，他这次的表态和意见在中央研究院赢得一片欢呼声。《矢与的》本来作为中央研究院内部的墙报，是贴在单位大门口的一间平房里的，但因为外单位来看《矢与的》的人太多，后来壁报的稿件就被贴在长幅的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最热闹的新市场。这样，《矢与的》的影响就不再局限于中央研究院内部了。这份壁报的张扬，自然引起了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的许多读者对整风动向的关注和思考。“三月下旬王震同志到中央研究院看了墙上王实味的文章以后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一个深夜，毛泽东同志提着马灯来研究院看了《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sup>①</sup> 包括《矢与的》在内的一些正式刊物和临时性的墙报上的刺眼之作、逆耳之音，无疑震惊并激怒了为了延安现时的安定和平浴血疆场并随时准备奉献生命的将领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他们都无法接受由这些享受着根据地相对宁静的后方生活的笔杆子们所揭示的真实，当然更不愿相信这已揭示的一切。他们的不快和恼怒固然可以理解，但在这种情绪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潜在的居功自傲和听不得批评意见的狭隘心理呢？而对毛泽东来说，《矢与的》上的文章则更加深了他刚读完《野百合花》时的感想：“《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sup>②</sup> 面对如此不留情面、尖刻锐利而又如此广泛普遍的批评

---

① 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② 沈瀚：《怀念张如心同志》，《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指责，作为整风发动者的毛泽东可能也是始料未及的。文艺界的状况促动了毛泽东对整风趋势的拨转，于是，整风的局面开始向另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这个方向与整风动员时预定的方向已相差甚远了。

1942年3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出席了《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会上他严肃指出：“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sup>①</sup>毛泽东的讲话显然有感而发，而其中的“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对那时情形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是针对《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而言的。座谈会上，《解放日报》社长博古为前一阶段报纸编辑方针的失误和对整风精神理解的偏差作了自我批评。于是，人们所看到的四月份的《解放日报》开始呈现出有别于三月份的另一种面貌。犹如一个最有效的风向标，《解放日报》的改版，直接昭示了今后整风的新趋势和新的具体做法。4月5日和4月6日，关心整风的所有读者都看到了两篇不同以往倾向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自我批评从何着手》。这两篇文章不仅严格区分整风斗争正确与不正确的方法，而且也把整风的对象从党内延伸到知识分子。“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演说中所提出的‘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痛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中竟然毫无善意的反应，这不又是怪事中的怪事吗？”社论对毛泽东的最新讲话作了精湛的发挥，这对原来天真地抱着帮党整风心愿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来说，应该是一帖强力高效的清醒剂。当4月7日《中共中央宣

---

<sup>①</sup> 《在本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批评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办法》，《解放日报》，1942年3月31日。

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见报后,整个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式进入第二个阶段。

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延安文艺界人士对运动风向改变的感觉显得有些迟钝。除了少数决策参与者外,大多数人对《解放日报》上的新社论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就在有丁玲和周扬参加的四月初的高干学习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整风运动中存在三个问题”时,特别提到“青年有不满和不安的情绪,文艺界有一个方针问题”。针对《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贺龙同志在会上愤慨地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这种与王震将军看过《矢与的》后相仿佛的情绪表达出现在“四三”决定后,本应对当事人产生相应的触动,但与会的丁玲却仅仅感到迷惑不解,只以为是贺龙的误会。丁玲似的糊涂并不偶然,四月初已受到非议和批评的《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检讨的同时,还广泛征求意见,期待着再有来年的《轻骑队》。还有那个桀傲不驯的王实味,尽管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找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封信,转达毛泽东希望其改变错误立场的意见,他却依然执迷不悟如故。为了尽快结束文艺界思想无序的现象,毛泽东开始属意于一场以纠正文艺方针政策的错误偏向与铲除延安文人自由主义作风和平均主义观念为主的整顿,一场专门针对文艺界的思想整风。为了了解情况,毛泽东写信给作家欧阳山、草明夫妇,请他们帮助搜集反面意见和材料,供他参考。此后,毛泽东又一一邀请李又然、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等诗人作家到杨家岭谈话。在和艾青的一次交谈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

话》上……”<sup>①</sup>毛泽东的感慨主要是针对前一时期文艺界对延安阴暗面的激烈批评而言的。毛泽东认为这种暴露并非题材问题，而是文艺家对延安社会的态度问题。在另一次邀集鲁艺的几位党员作家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的谈话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承认他与文艺家们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譬如怎样对待延安社会存在的不足，譬如暴露黑暗还是歌颂光明。针对文人们的委屈情绪，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没有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sup>②</sup>和作家们的交谈接触，使毛泽东摸清了文艺界的症结。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毛泽东和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一起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于1942年5月2日和5月23日分别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绪言和结论两部分讲演，一方面对前段时间文艺界出现的与延安光明现实不协调的言论和观念一一加以剖析指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以及如何为工农兵的条例细则。《讲话》终于使大多数延安文人茅塞顿开，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自此，毛泽东的《讲话》不仅成为整风前后期的界碑，也成为整个解放区文学前后期的标志。

尽管毛泽东发表《讲话》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他深感忧虑的延安文艺界的一些问题，但从其客观效果看，《讲话》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远不仅仅于此。毛泽东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延安文艺问题发表的这些意见和指示，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正奠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的理论基础。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讲话》的基本精神更是主导了新中国文艺的进程和发展方向，成为惟一的行动指针。

---

① 参见艾克恩编纂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5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② 参见艾克恩编纂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4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